

论星际交流中的“接收者待在”与“符号主体”^{*}

韩嘉祥

摘要：近年来，太空探索随航天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更广泛的实践，其中以沟通“异星智能体”为目的的被称为“星际交流”。然而，由于异星智能体迄今仍未被发现，星际交流便以思想实验和具体实践的纠缠身份存在，“意图接收者”在当下的缺席，也窄化了其意义阐发空间。本文试图从传播符号学的符号过程及符号指称方向对以星际交流为例的“接收者待在传播”进行特征描述与辨析，指出其在人类中心主义诟病外的更多意义：意图接收者的暂时缺席，并非增强发送者的传播主体地位，而是通过抽离作为内容的具体传播要素，凸显形式化的符号过程之主体性，让符号主体成为传播主体——这同样有助于回应人工智能中的“待在智能”问题。

关键词：传播符号学，星际交流，符号主体，自我指涉，接收者待在

On “Becoming-Receiver” and “Semiosis-Agent” in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

Han Jiexiang

Abstract: Recent advancements in space technology 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space exploration, including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 aimed at potential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e lack of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49）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23&ZD212）阶段性成果。

evidence for such intelligence renders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 a complex interplay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undertakings. The current absence of an “intended receiver” imposes limitations on its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Becoming-Receiver Communication”, as exemplified by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semiosis and referential dynamics within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It argues that, while often criticized as anthropocentric, this form of communication carries deeper implications. Specifically, the absence of an intended receiver does not amplify the sender’s dominance as the Communication-Subject. Instead, it highlights the intrinsic subjectivity of semiosis by abstracting away concrete content elements, thus allowing the Semiosis-Agent to emerge as the true Communication-Subject. Furthermore,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addressing the “Becoming-Intelligence” iss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 Semiosis-Agent, self-reference, Becoming-Receiver

DOI: 10.13760/b.cnki.sam.202501010

引言：于思想实验与具体实践的纠缠处反思

思想实验 (thought-experiment) 是人文学科用以扩充人类认知边界的重要途径。赵毅衡 (2024a) 将其总结为三个环节：“其一，在筹划与预设中凸显，清晰化有关问题；其二，悬置形成干扰的不纯条件；其三，可让别人重复，或在复杂条件的实践中再次检验。”自然科学的真实实验 (real-experiment) 与思想实验在前两个环节无大区分，第三环节的差别则需仔细甄别。前半句的“可重复”亦相通：思想实验必可在脑内重复；哪怕真实实验的复现条件极为苛刻，“可重复”所蕴含的科学性仍是旨归。关键在后半句“复杂条件的实践中再次检验”：自然科学追求实用性，真实实验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实践检验；思想实验往往刻意与实践保持距离，导致它们在具体实践中会激发更多的问题。“渡鸦悖论”“蓝绿宝石悖论”等一类逻辑归纳谜题无法实践，此种断裂姑且不提，“电车难题”“无知之幕”等伦理学问题的实践则极具社会价值。而原发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思想实验更值得探讨，其具体实践借由科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加码而不断发展，倒逼人们对思想实验本

身进行反思：“电车难题”是自动驾驶汽车厂商的必修课，其延伸出的“自动智能驾驶悖论”新变体被认为“伦理学上无解”（赵汀阳，2022，p. 26）；当人工智能的通过率远远超出图灵测试的30%标准，人们又该如何区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上述这些例子证明，思想实验因其实践的复杂性，必须分而论之，思想实验与具体实践的纠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体现此种纠缠的典型之一，是一类意图与“异星智能体”沟通的人类活动，彼得斯（2017，p. 355）将其称为“星际交流”。人类自古就对太空有所欲求，屈原在两千多年前追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20世纪50—60年代的美苏太空竞赛，也为科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人们悬置了技术的不可能，描绘了大量与异星智能体接触的场景；2024年10月13日，马斯克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starship）第五次试飞，并使用发射塔成功回收了火箭助推器——“星际移民”的可能性又添了几分。而当人类真正站在浩瀚星辰中，如何处理现有星际交流中“待在的意图接收者”，就从一个颇具思想实验色彩的问题（如电影《降临》^①），上升为人类文明整体不得不面对的基础议题。本文将从星际交流的具体实践谈起，讨论此类符号传播活动的思想实验性，以及“接收者待在传播”的特征及其内含的传播主体问题。

一、“太空传播符号学”的建立可能与基本问题

（一）从“载体”到“意义载体”：太空探索的符号传播维度

太空探索通常会向太空发射承载地球非生物物质与生物的航天器以及承载信息的电磁波。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科学研究，如观察宇宙环境（不同光周期、微重力等）对植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检测航天器载人能力。科学应用之外，不难体会这一类活动符合一个基础的、直观的传播模式，如图1：

^① 《降临》（*Arrival*, 2016）改编自特德·姜（Ted Chiang）的短篇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影片讲述了语言学家路易斯试图与外星人沟通，并通过理解外星语言改变了自身对时间和命运之认识的故事。

□ 符号与传媒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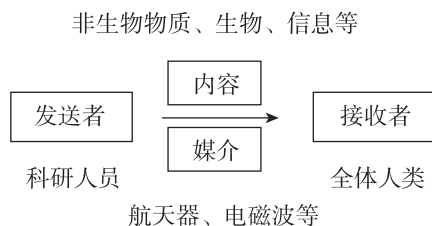


图 1

然而，太空探索的传播属性不仅在于它符合将“内容”从甲处运输到乙处这一基本的传播模式，更在于其整个传播链条在文化语境中卷入了大量的意义。航天科研人员会因工作的保密性而被誉为“无冕之王”；首次登月的阿姆斯特朗，他的一小步被称为“人类的一大步”。下面这个例子更直观地展现了太空探索如何从纯然的科学目的中跳脱：1963年，法国将一只代号“C341”的猫送入太空。当它顺利返回地球后，媒体借用法国著名漫画形象菲利克斯猫（Felix the Cat）的名字，称它为“Felix”。从名称上可以看出，“C341”仅具有实用意义，而“Felix”则充满象征意味——这是一只颇负盛名的猫。

整个传播链条的意义机制研究背靠的理论域是传播符号学。近些年，传播符号学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与领域得以诞生，在国内外传播研究中均取得了重要的影响和发展（胡易容，马翊昂，尹婧雯，2024）。费斯克（2008，pp. 1-2）曾区分了传播研究两大流派：“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前者侧重信息的传递过程，后者关注的是符号文本在文化中的作用：“太空猫”菲利克斯是巴尔特口中履行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神话”；航天器这一媒介载体也不单发挥物的使用功能（即运输功能），而是携带大量意义，成为“符号物”，参与国家形象的构筑。因此，太空探索所具备的“传播属性”应当被修正为“符号传播属性”，每一次太空探索所进行的意义撒播难以估量——“太空传播符号学”的论域也就得以建立。根据“符号发送者-符号文本-符号接收者”这个健全符号过程的最简式，可绘制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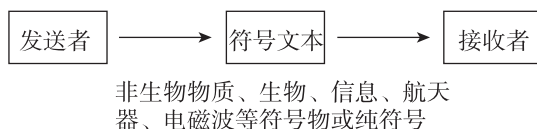


图 2

（二）星际交流：太空符号传播中的特殊实践

在大多数太空符号传播中，人类自身就是意图接收者，太空探索的结果“为己所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然而，彼得斯所说的星际交流更为特殊，其意图接收者是人类之外的异星智能体。虽然异星智能体迄今仍未被发现，但它并非纯然的想象，科学家坚持赋予其存在的客观性——这就与“神”“上帝”“亡魂”等非客观存在有了区别。天体物理学家韦斯特比和康塞利斯估算出了银河系中地外文明的数量：可能存在至少 36 个与地球文明类似的、具有无线电交流能力的外星文明（Westby & Conselice, 2020）。因此，这一符号传播活动便以引言中所提的思想实验和具体实践的双重纠缠身份存在。

星际交流之于大多数太空符号传播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的意图接收者是异于人类物种的，具有绝对的“他性”（otherness），并借此铺设了交流的前提，这体现了人类深层意识中存在的交流渴望；另一方面，意图接收者虽然理论上存在，但证明其存在的有力证据出现的可能性（人类单方面检测到抑或收到异星智能体的反馈）微乎其微。借此逻辑，星际交流的意图接收者可被认为是“待在”的。

事实上，人类甘愿为这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努力。在星际交流实践中，人类发射过无线电，也有先驱者号、旅行者号等著名的深空探测器。1974 年，阿雷西博（Arecibo）射电望远镜发射了一段二进制电报，包含地球位置、人类的 DNA 结构等信息，目标是距离地球约 2.5 万光年的球状星团 M13；1971 年和 1972 年分别发射的先驱者 10 号、11 号携带着相同的镀金铝板，其上用科学的语言刻画了地球的位置及人类样貌等信息；1977 年发射的旅行者号则与先驱者号有所不同，其以铜制密纹唱片的形式收录了 55 种用人类语言向外星生命传达的问候，此外，还有 90 分钟的各国音乐录音，代表中国的是古琴名曲《高山流水》。

美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萨根是先驱者号、旅行者号所载星际信息的设计者之一。一位科学家向萨根提出了如下建议，促使他最终选择了音乐：“外星生命截获这一信息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无疑会有数以亿计的地球人看到它。因此，它真正的功能是唤起地球人的热情，激发更多人去寻找外星生命。”（萨根等，2016，p. 23）这个建议充满了浪漫情怀。中国艺术家徐冰则以艺术的方式将浪漫推向极致。2021 年 2 月，一枚涂满了徐冰标志性的“天书”文字、名为“徐冰天书号”的火箭在甘肃酒泉发射。虽最终发射失败，但火箭残骸及坠落爆炸后形成的“环形山”，意外地创造出更具视觉冲击力

的大地艺术。

悬置一切技术与时间阻碍，假设上述星际交流均获成功，人类的目的是聚焦为向异星智能体证明地球文明存在，并希冀它们能通过这些星际信息理解地球文明。不难体会，站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角度，无线电波、深空探测器本身就完成了“证明地球文明存在”这一终极目标，不必额外承载人造符号；此外，从无线电这一信号传输方式，到先驱者号的图像，最后到人类自身都无法识别的“天书”，其符号化程度与传播通达度成反比——最有可能被解读的反而是作为信号的电波。符号学艺术史先驱贡布里希（Gombrich, 1972）曾分析先驱者号的图像星际信息，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视觉图像不仅仅是‘现实’的再现，而是一个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换言之，因为人类与异星智能体共用一套符号系统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①，故无论何种“科学”的语言、何种“像似”的视觉图像都无法让对方成功解读。这就带来了太空传播符号学的第一个基本研究问题：关于符号文本的表意及可解释性——为什么这些符号文本可以代表地球？它们如何才能被异星智能体成功解读？

然而，不共用一套符号系统而导致的交流障碍在跨文化现象中俯拾即是。去掉“上述星际交流均获成功”这一假设后，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便浮出水面：由于交流的意图意义与意图接收者“待在”的客观现实相悖，故意图接收者只得被悬置，星际交流的更多意图意义就通过返回发送者及其所处的解释社群来实现这一符号过程的闭环。换言之，人类自己消化了前述相悖之处，充当了实际接收者——这自然是有价值的，前文提到的“国家形象传播”以及“激发人类对太空探索的渴望”正是如此。

必须要明确星际交流的本初意图接收者不是人类，否则不必以“星际”命名。所以哪怕返回人类自身的意图再多，也无法构成“接收者待在传播”的全部价值，甚至从字面意思上讲，返回人类的意图只是这部星际交流乐曲中的“副旋律”。可现实困境是，活在当下的人们无法跨越漫长的时间去等待这一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实现。诸多科幻小说（如《三体》）通过文学想象将这一丝客观可能性转制为“精神食粮”，从而填补在人类短暂生命中难以满足的渴望。于是乎，“副旋律”就不自觉地跃升为“主旋律”，忽视了这部乐曲本应是和谐的复调——而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

^① 这个说法稍嫌绝对，但即使在科幻小说中，虚构共用一套符号系统的异星文明往往被认为是没那么科学的“软科幻”。

这是星际交流的根本意图。这便是太空传播符号学的第二个基本研究问题，同样也是本文意欲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符号过程中明确“接收者待在传播”的特殊性并尽可能完善其意义阐发。

二、“接收者待在传播”：含义与辨析

（一）以符号过程观之

前文从符号过程发现了“接收者待在传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妨接续这个宏观视角，先尝试对其做一个描述。“接收者待在传播”（Becoming-Receiver Communication）是这样的一类符号传播活动：其意图接收者处于“待在”状态，只具备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以及未来长时间内的意图接收者“缺席”，故在当下发送者自身及其所处的解释社群会充当实际接收者。

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决定了“接收者待在传播”与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非实存（如“亡魂”“神”“天”）有本质区别：后者是人们通过想象力补全的符号传播活动，意图接收者通过想象力成为一种“既在”。拿甲骨文占卜举例：卜者向“天”传达信息，随即产生“天意”，表现在开裂的龟甲上。实际上，这个符号过程中的“立法者”还是作为发送者的人本身。此外，如果过分相信虚构非实存的“既在”，则会陷入精神上的迷狂状态。

需要声明的是，“接收者待在传播”并非星际交流所独占；更进一步，“接收者待在”是所有传播与交流的内在动力。但内在的应然动力与从外部观察到的实然结果有所不同，本文选择借后者持有的“第三人视角”来描述和辨析。在人类自身的传播活动中，意图接收者待在表现为：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寺庙底部会埋藏一些记录着特定信息的石碑，人在幼时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这类古老且朴素的传播类型在 20 世纪以“时间胶囊”（Time Tube）的身份出场。1939 年的纽约世博会埋下了一颗胶囊，计划要到 5000 年后开启，其中包含了爱因斯坦给后人类的一封信。5000 年似乎还不够久远：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曾受美国能源部委托，处理核废料的警示符号问题，他需要面临的时间跨度则以万年计，胡易容、康亚飞（2023）将其命名为“深时间”——人类文明 5000 年的存续已有证据，但能否再延续万年并未可知。

“发送者自身及其所处的解释社群会充当实际接收者”意味着，实际接

□ 符号与传媒 (30)

收者与意图接收者有区别。整个符号过程与完整的接收之间存在因意图接收者待而在留下的罅隙。罅隙在星际交流中更难以弥合。正如前文所提，星际交流作为“接收者待在传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它的意图接收者是人类生物学定义的外物种。人类内部的符号系统会被传承，且具备一定的家族相似性，而在星际交流中，星际信息的传达、解读、反馈面临着三重困难，在这三重压力下，意图接收者受到的忽视程度便更高。“解释社群”则是在强调，实际接收者的身份需要获得共用一套意义标准的社群的承认：星际交流对于不相信异星智能体的人来说根本是荒谬的。

在对“接收者待在传播”的内涵进行阐释后，还需回到“待在”这一概念去理解两种与之相近的传播类型。“待在”意为一种终会结束的缺席，是“应在未在”的状态。实际上，意图接收者的缺席并非都如星际交流一般，完全由其自身存在的客观低可能性造成，它也会因为某种偏向呈现为暂时缺席。如果偏向符号文本，可理解为沉默传播；若偏向发送者，则是情绪性传播。即便这两种传播类型不严格符合本文所定义的“接收者待在传播”，但仍有必要辨析之。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包括“名讳”在内的“讳文化”，胡易容与康亚飞(2021)将其总结为“沉默传播”这种特殊的传播类型。比起一般的符号传播，沉默传播是反直觉的：发送者看似通过忽视符号文本而忽视接收者，实则是想让接收者准确接收到自己的意图意义。这在艺术作品中极为常见：著名的音乐作品《4分33秒》，从头至尾都没有出一个音，但正是其先锋、解构的意义借由空符号被观众成功接收，才在演奏结果时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沉默传播要在传播通达中呈现，意图接收者是一种“假性待在”。

互联网建立的全球信息网络并未让人们减少分歧，反而让情绪大行其道，出现了一种忽视接收者的“情绪传播”——接收者被情绪掩盖，而被迫待在，这常出现在网络舆情事件的评论区。雅柯布森(Jakobson, 1960, p. 357)提出了语言交流的“六要素与六功能模型”：当语言交流偏向发送者时，体现的是语言的情绪功能。情绪传播充斥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交流，但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情绪传播拥有规范的符号过程。情绪先行，则传播效果与目的背道而驰：观点并未因传播与交流达成某种共识，反而因为偏倚发送者，使得原有观点僵化，出现“群体极化”现象。事实上，情绪传播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重视接收者：人们通常会在愤慨一阵后才会删去自己在评论区中的不恰当发言。

（二）符号指称方向：“接收者待在传播”的自指特征

前面已从宏观的符号过程角度对“接收者待在传播”进行了特征描述与辨析，下面从符号指称的微观视角出发，更能确定其本质。如此行文的目的是，符号指称（reference）确定了符号与对象的基本关系，此层面在具体实践中难以觉察，但因其自反性而直指问题的根本。

康德（2017，p. 22，p. 56）的先天综合判断试图说明，经验材料必须经过时间和空间这对感性形式直观后，再通过 12 个知性范畴的作用才能被把握。这种先验设定为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时间和空间成为基础的“概念比喻”（conceptual metaphor），广泛出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这一领域的教科书《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开篇例子就是“时间是金钱”，它也辟专章讲述了基于空间的方位隐喻（莱考夫，约翰逊，2015，pp. 4 - 6，pp. 11 - 19）。

符号学中，符号与对象的指称关系也存在着时空的概念比喻。皮尔斯（2014，p. 56）在描述指示关系时，借用了空间：“……它与个别的对象存在着一种动力学（包括空间的）联系……”赵毅衡（2017）为说明“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绘制了图 3。图中箭头的长短不同，是为了生动地表明在不同理据性下符号到意义的距离有所不同：指示符直接引起接收者的反应，几乎无距离；规约符则无法自然习得，故距离最远。



图 3（注：笔者按照原图重制）

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空间的结构关系带来了符号指称的方向性隐喻。古德曼将符号学与分析哲学融会贯通。在其指称理论中，他用“直指”（denotation）和“例示”（exemplification）替代了“再现”和“表现”，以修正皮尔斯以理据性为基础建立的符号类型体系。在古德曼（Goodman，1968，p. 52）看来，直指是从符号到对象的一种关系；例示则恰恰相反，符号充当了对象的样本：“无论被再现的东西是否是具体的，无论被表现的东西是否是抽象的，差不多就像图像将其再现的东西归为一个实例（instance），被表现的东西将图像归为一个实例。”

例示关系表明符号有挣脱对象的动力。直指关系中，符号在指向对象完成释义后会自我取消，所谓“得鱼忘筌”，在传播与交流中体现出明显的他

□ 符号与传媒 (30)

性，而由于例示的释义要落在符号上，故符号获得了某种独立性：人们对凡·高作品《农鞋》的艺术欣赏，绝不会停留在“这是农鞋”的判断中；抽象艺术更会跳过对象，人们甚至无法做出“这是什么”的判断。这就体现了第三种指称关系：符号的自我指称（self-reference）。雅柯布森较早对符号自指进行研究。在前面提到的模型中，他认为如果语言交流偏向信息（message）本身，强调对信息本身的关注，就获得了诗性（poetic）（Jakobson, 1960, p. 357）。诗性导致符号与对象脱节，不妨仿照图3，画出符号指称的三种方向，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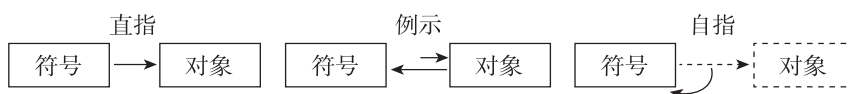


图4

从概念比喻角度澄清符号指称的三种类型所具备的不同方向性后，可将其与前述以符号过程观之的传播活动一一映射（图5）：在直指关系中，符号指向对象，正如沉默传播以及一般的符号传播活动完成了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完整传播；在例示关系中，符号虽然也指向对象，但更多是对象回指符号，对应情绪性传播中的发送者偏倚；在符号自指中，符号摆脱了具体对象的束缚，指向自身的存在，这就对应了星际交流这种严格的“接收者待在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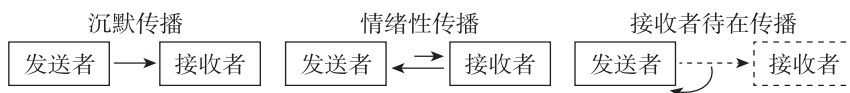


图5

至此，本文用宏观符号过程和微观符号指称方向两个角度相互补充，可得出对“接收者待在传播”的完整描述：其意图接收者处于待在状态，只具备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以及未来长时间内的意图接收者缺席，故在当下发送者自身及其所处的解释社群会充当实际接收者。这种符号传播活动带有明显的自指特征。

三、边界扩展与形式激发：“接收者待在传播”对符号主体的意义

（一）“自指危机”与发送者的主体膨胀

艺术往往指向自身，这是艺术性显现之保证。“接收者待在传播”凸显的自指特征之问题是：当传播与交流局限在人类内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论调将使自身的各种欲望膨胀到极致。美国哲学家内格尔在他著名的文章《作为一只蝙蝠是怎样的体验?》(Nagel, 1974)中认为，即使我们能够科学地分析蝙蝠的生理机制，但因为缺乏作为蝙蝠的“经验主观性”(the subjective character of experience)，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蝙蝠。

借内格尔的观点，星际交流可被认为是一种彻底的“自说自话”行为。星际交流承载的星际信息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传达；对其解释，大多退回到如那位科学家所言的“浪漫情结”或凸显萨根(2016, p. 24)所言的“人类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虽然人们与异星智能体缺乏双向互动，但使用一种不考虑接收者、未经精心设计的沟通系统未免太过草率和傲慢。当人类内部的跨文化交流出现阻碍时，双方几乎无需约定地“手舞足蹈”，使用各种姿势辅助交流；面对动物时，人们也会模拟它们的叫声去尝试交流。尽管尝试的有效性还有待评估，人们还是找到了与他者沟通的应然模式——然而，这一准则在面对低客观存在可能性的异星智能体时却被忽视，传播走向了自指危机。

如果从更广泛的媒介技术实践来看，自我指称也引发了更多讨论：符号学家诺特(2019)较为乐观，他认为“媒介中的自我指涉很难说是颠覆性的……没有想要表现符号之外的世界这种野心，所以它是不能传递颠覆性信息的……”而传播哲学家弗卢塞尔(2021, p. 125)则结合符号学思想对媒介技术进行批判，他认为媒介技术创造的技术图像符号区别于传统图像符号，“它们不是从外部接收含义，而是向外部传递含义，它们为荒谬赋予意义”。

实际上，当符号和媒介不再指向外部世界，而是指向自身或其他类型的符号或媒介，指示性的理性便瓦解了。媒介技术从中作祟，抢夺了文学想象对“可能世界”的创造力；此种技术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而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92, p. 12)所认为的“一种通过广告、媒体、图像将万物符号化”的传媒景观，当今更是有了新变体：“元宇宙”(metaverse)

□ 符号与传媒 (30)

试图创造一个独立的“元世界”，成为符号传播的元媒介，其中也具有明显的自我指涉现象（赵星植，2022）——这已然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境遇，无论是媒介、符号还是借由二者的符号传播，这些自指特征足够使人警惕。

(二) 符号主体的出场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为自指危机带来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将符号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immediate object）与“动力对象”（dynamical object）。前者是实际所指，但后者才真正决定符号的意义，“真正有效但不立即存在”（CP 8. 343）。动力对象是一种经验，“符号无法表达动力对象，它只能指示动力对象，并让解释者通过附带经验来发现”（CP 8. 314）。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接收者待在传播”中，此处的经验恰恰需要明确符号过程中的主体为何并由其提供。主体通俗来讲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在哲学上表现为“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西方知识界根据个人理性创造的概念，涉及人的自我意识、意图和行动的自我引导能力。

本文认为，符号过程的主体不是发送者和接收者两端，也不以符号文本为中心，而是一种基于完整符号过程的多元意义空间，即“符号主体”（建议英译为 Semiosis-Agent）。之所以用“semiosis”这个由皮尔斯提出的概念，而不用“sign”或者“symbol”，是为了避免“以符号文本为主体”的误解——“semiosis”是“一种行动或影响”（CP 5. 484）。选用“agent”则是为了区别于“主体性”这个几乎局限在人类种群内部的概念；当然，它也具备“（起作用或影响的）动因”这一意涵。

符号主体兼具主体与主体性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建立以符号为主要部分的工作预设，卡西尔的符号文化哲学、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均如此。弗卢赛尔（2022，p. 54）更是高度肯定符号之于传播的重要性，称“人类传播原则上是源于象征形式的符号”。其次，符号主体拥有意识，是一个可以自我调整的系统。洛特曼曾多次援引耗散结构的开创者普里戈金，认为文化和耗散系统一样，也处于未完成的活态，需要和外界进行交换。他基于此提出了“符号域”的概念：“任何一种语言都沉浸在某种符号空间中，只有通过与这一空间的互动才能发挥作用。”（Лотман，2000，p. 251）当然，此处的“意识”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正如皮尔斯（CP 5. 313）所言：“可以说，人是有意识的，而语言却没有意识……但这种意识仅仅是一种感觉，只是人-符号（man-sign）物质品质的一部分。”

将人等同于符号所得的“人-符号”概念很关键，皮尔斯（CP 5. 313）

继续解释道：“正如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这一事实，结合生命是一连串的思想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类是一个符号；同样，每个思想都是一个外部符号，证明了人类是一个外部符号。”符号拥有意识，它填补了人之内外（内部思想与外部世界）的罅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格尔的经验主观性问题，更弥合了不同物种间的差异——人的有机体只是符号的工具。

符号主体是一种共建的活态主体，在符号传播活动中，各环节共同作用。诚然，在这个符号主体中，人类因其生物能力暂时居于主导，但这并不影响符号传播是一种协商制：异星智能体不会因为难以回应、低客观存在可能性，就在符号传播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它们和人类同是符号主体中的一个角色。

（三）“接收者待在传播”对符号主体的作用

当明确了符号主体后，“接收者待在传播”之于符号主体的意义就呼之欲出：星际交流将人类整体视为一个发送者，预设了外物种的异己接收者。异己接收者的出现，首先使符号主体的边界得到了扩展，生态得到了丰富。符号学中，符号文本从纵向的聚合轴和横向的组合轴两个向度展开：前者类似菜单，后者则是最终上桌的菜。若聚合轴的可选对象少，就呈现为“窄幅”，反之则为“宽幅”。实际上，双轴操作不仅体现在符号文本上，也体现在整个符号过程中：发送者和接收者位置上的“备选角色”增加，拓宽了以人类为主要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窄幅”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接收者待在传播”通过抽离作为内容的具体传播要素即异星智能体这一具体接收者，凸显了形式化的符号过程之主体。意图接收者暂时缺席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符号过程的完整性，即一种抽离具体内容的形式存在。回到前文所提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其中，信息是具体内容，媒介则是与之相对的形式。这个名言恰恰印证了形式研究之于传播问题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它悬置了作为内容的信息。符号学与媒介、传播研究的接合并不少见：在艾柯（2018，p. 53）那里，媒介是作为“连续体”的符号载体，即相对内容而言的质料。日本符号学家筱原资明（2001，p. 14）就觉得“媒体论（这里主要指《理解媒介》的相关内容）正在以某种形式靠近他（艾柯）的符号论”。这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符号学重视的形式与内容，同样是传播研究的关键点，相关研究均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研究”。而这种接合点正是传播符号学这一论域所重视的：具体的接收者与符号过程中的接收者，正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之“死”，换来形式之“生”。而“接收者待在传播”的魅力，恰恰来自“生”与“死”之间

□ 符号与传媒 (30)

的张力、直接对象与动力对象之间的张力，以及具体与形式之间的张力。

形式上的健全要求符号主体不单单要重视符号文本，更要重视符号过程的完整链条，甚至涉及符号生产及传播准备的“前过程”。由此观之，文化传播符号学并不如“非表征主义”批评的那般只关注“木已成舟”的符号文本，而是拥有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结语：“待在”的智能——从“太空传播符号学”到“异智能体符号学”

本文讨论的起点对象是太空传播符号学和异星智能体。再进一步，待在的意图接收者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待在的智能，属于“异智能体符号学”的论域。赵毅衡（2024b）对“异智能体”进行分类：

1. 低于人类智能水平的“亚人类智能体”，包括所有具有一定智能的生物；
2. 目前在人类社群中已经出现的“人工智能异智能体”，即尚未达到人类水平但进化神速的弱 AI 体、期盼中不久将出现的强 AI 体以及必将来到的超 AI 体；
3. 未来终究会与人类见面的“异星智能体”。

该分类方法具有明显的生物学特征。若依照符号传播的时间维度，不难发现，超 AI 体与异星智能体可归为一类——这并非表明后者智能必定高于前者，而是因为二者皆处于待在状态，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深远影响；当今已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弱 AI 体，则可与具有一定智能的生物归为一类，二者皆为一种既在，人类正逐步适应与其传播互动。因此，太空传播符号学在某种程度上与 AI 符号学面对同一个难题：技术乐观主义者坚信超 AI 体终会到来，天体物理学家也坚信异星智能体终会到来，超 AI 体交流就与星际交流一样，同属于“接收者待在传播”，二者都预设了长期处于待在状态的意图接收者。

再次声明，“接收者待在传播”研究的本初意图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宇宙万物的统摄与侵染，意欲建立一个“符号宇宙”，而是基于形式化抽离，让符号主体成为传播主体，从而为宇宙万物的同处提供一个传播符号学方案。待在的意图接收者暂时是缺席的，但涉及既在的问题，即存在论问题：人们游戏般地假设一个具备客观存在性（AI 符号学借由技术，太空传播符号学则借由天体物理）的符号接收者，从而反思自身可能遇到的生存问题。此类反思必须在形式化的符号主体保证的平等前提下展开，才能助益于人类认

识自身的局限与潜能。至于认识到局限与潜能后是选择“回答”还是“不要回答”^①，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引用文献：

- 艾柯，翁贝托（2018）. 康德与鸭嘴兽（刘华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彼得斯，约翰（2017）.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弗卢塞尔，威廉（2021）. 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弗卢塞尔，威廉（2022）. 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周海宁，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费斯克，约翰（2008）.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易容，康亚飞（2021）. “‘沉默’传播”：中国古代“讳文化”的普遍符用学阐释. 国际新闻界，9，101-115.
- 胡易容，康亚飞（2023）. “核符号学”：跨越深时间的文化传播思想实验. 跨文化传播研究，2，157-177.
- 胡易容，马翊昂，尹婧雯（2024）. 意义理论再出发：2023年传播符号学研究前沿综述. 新闻界，1，59-68.
- 康德，伊曼努尔（2017）.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莱考夫，乔治；约翰逊，马克（2015）.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诺特，温弗里德（2019）. 媒介中的自我指涉：符号学框架. 载于温弗里德·诺特，宁娜·毕莎娜（编）. 媒介的自我指涉（周劲松，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皮尔斯，C. S.（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萨根，卡尔，等（2016）. 星际唱片：致外星生命的地球档案（杨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筱原资明（2001）. 埃柯：符号的时空（徐明岳，俞宜国，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赵汀阳（2022）. 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星植（2022）. 元宇宙：作为符号传播的元媒介. 当代传播，5，36-39.
- 赵毅衡（2017）. 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04-113.
- 赵毅衡（2024a）. 思想实验：以形式研究的辩护为例. 文艺争鸣，7，80-85.

^① 《三体：地球往事》中的“不要回答”是刘慈欣提出的一个关键警示，指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即在宇宙生存中慎重应对外部信息。

□ 符号与传媒 (30)

- 赵毅衡 (2024b). 异智能体符号学的四个基本方面. 新闻界, 9, 50 - 59.
- Baudrillard, J. (1992). *Transpolitics, Transsexuality, Transaesthetics* (M. Valentin, Trans.). In W. Stearns & W. Chaloupka (Eds.),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Goodman, N. (1968). *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 New York, NY: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 Gombrich, E. H. (1972). The Visual Image. *Scientific American*, 277 (3), 82 - 96.
-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Nagel, T.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4), 435 - 450.
- Peirce, C. S. (1934).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958).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stby, T. & Conselice, C. J. (2020). The Astrobiological Copernican Weak and Strong Limits for Intelligent Life.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896 (58), 1 - 18.
- 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емioticsфера*. С. -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作者简介:

韩嘉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研究方向为传播符号学、数字符号美学。

Author:

Han Jiaxiang, Ph. D. candidate of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semiotic aesthetics of digit.

Email: 825509369@qq.com.